

GJWTCKYC
国际问题参考译丛

中国以色列

建交亲历记

A CHINA DIARY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Israel
Diplomatic Relations*

[以] 泽夫·苏赋特 著 *E. Zev Sufott*

高秋福 译

新华出版社

国际问题参考译丛

中国以色列建交亲历记

〔以〕泽夫·苏赋特 著
高秋福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以色列建交亲历记/ (以) 苏赋特著; 高秋福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0.4

(国际问题参考译丛)

ISBN 7-5011-4798-1

I. 中… II. ①苏…②高… III. 建立外交关系: 中外关系 - 以色列 IV. D822.33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4793 号

A China Diary: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 - Israel Diplomatic Relations

Copyright © 1997 E. Zev Sufott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1999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This translation of A China Diary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rank Cass & Co. Ltd., London, Englan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中国以色列建交亲历记

[以] 泽夫·苏赋特 著

高秋福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875 印张 137,000 字

2000 年 4 月第一版 2000 年 4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798-1/D·765 定价: 14.00 元

(内部发行)

中文版序

真正称得上研究过去几十年中国同以色列关系的著作，迄今尚未见出版。如果有人将意识形态、政治信条、忠信恪守、利益洞察和务实态度在制定中国对外政策中的相互作用作一番阐释和分析，那会大有裨益。本书研究范围有限，篇幅单薄，但却忝列已经出版的为数不多的研究中以关系发展某些侧面的作品之中，而这些作品大多还只是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单篇文章。真正研究中国对整个中东地区政策的著作还是有的，但所有这些著作都是零零碎碎地偶尔提及以色列。

希望在本书中文版刊行之后，很快会看到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全面研究中以双边关系和中国对以色列政策的著作出版。对这样一个命题，本作者在其最近即将发表的研究以色列对华政策（1950-1992）的文章中，曾试图从以色列的角度加以解决。^{*} 这篇文章援引了以色

^{*} 这篇文章将发表于最近一期《以色列事务》杂志（伦敦弗兰克·卡斯出版公司出版）。

列政府档案馆中现已公开的以色列外交部的大量档案材料。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在以色列－巴勒斯坦争端问题上的政策发生演变，从以前的意识形态和偏袒一方的模式，演变到李鹏提出的更加务实的争取中东和平的5点主张，后来演变到90年代奉行的平衡政策。根据这一政策，中国支持争端各方进行谈判，支持争端各方在不放弃原则的同时采取灵活态度。这里体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主张。而所有这一切，都具体说明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近期演变的趋向。其根本目标是确保有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据此，争端都应通过谈判解决，而不应演化为武装冲突，给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利益和商业活动带来物质损失。研究中国20世纪后半期对以色列的政策，应有助于说明和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国家目标及其对外政策。

本作者特别感谢新华社所属的新华出版社和新华社副社长高秋福，因为是他们倡议并完成了《中国以色列建交亲历记》的中文翻译，而后在中国出版发行。新华社及其专业人员和新闻记者，是80年代末中国同以色列恢复接触活动的先驱。高秋福是中国最早访问耶路撒冷的代表之一。尤为令人高兴的是，本书记述了他在两国最初建立非正式接触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样令人高兴的是，对新华社在过去几年中给予的理解和帮助，对新华社在丰富和加强中以双边关系方面所作的贡献，本人

能有这个机会来表示谢意。本书能由新华社的出版社出版中文版，能由一位特别亲密的、备受尊敬的老朋友和老同事翻译成中文，作者甚感荣幸。

前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以色列国的首次正式交往发生在1950年1月，亦即共产党政权在北京建立后的几个月。那是1950年1月9日，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按惯例打电报给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通知他以色列承认中国的新政府为合法政权。一个已经存在的国家，需要采取这样一个行动，对一个新建立的国家或政权表示承认。一周之后，亦即1950年1月16日，耶路撒冷收到例行的感谢电报。可是，要经过40多年时间，两国关系才实现正常化。在此期间，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接触极为鲜见。后来仅有的几次接触是，以色列驻缅甸的第一位公使戴维·哈科恩与中国同僚的会晤。会晤于1954年初开始，最后以一个以色列官方代表团于1955年初访问中国作结。据档案记载，这些接触本来很有可能导致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建立外交关系。因为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在努力扩大其对外关系，确立其在国际上应发挥的作用。

华盛顿当时对以色列施加影响，反对同中国发展关

系和进行接触。但是，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阻止了耶路撒冷采取行动，却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以色列政府在给其驻缅甸公使和访问中国的代表团的指示中，明确提醒他们，除了探讨发展双边贸易的可能性之外，不要作任何承诺。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不结盟国家万隆会议，则打断了这种接触。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为其确定的国际作用发生变化，标志着中国同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发展关系的想法发生变化。甚至早在这次会议筹备阶段，中国就充分意识到，阿拉伯国家要求不要同以色列发展任何关系。

在此后的30年中，对以色列来说，中国处在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中国只向很少的几个以色列护照持有者发放了入境签证。在通常情况下，中国是不准以色列护照持有者入境的。两国之间的正式交往就更为罕见。1963年8月，中国把一件很特别的关于裁减核军备的外交照会发到以色列。中国很可能是误将以色列列入照会发送名单了。以色列作出了详尽的答复，包括建议两国进行交流并发展关系，但却如石沉大海，无半点回应。以色列政府并不因此而罢休，随后以提醒的方式又发去一个照会，但同样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中国同其他没有建立正式关系的国家，包括以色列的一些阿拉伯邻国，不但有贸易关系，而且贸易来往还非常活跃。但是，中国却不准同以色列进行直接贸易。两国之间的邮政联系，充其量来说也只是偶尔发生。70

年代初，一则新闻报道只不过提到两国之间将建立电话联系，就遭到中国的断然否认，说决不会同“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建立此种联系。“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是当时中国官方对以色列国的指称。

从1955年1月以色列代表团访问中国，到1987年9月两国外交部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首次会晤，30多年时间，两国政府实际上没有任何正式接触。1987年两国外长会晤的要求是以色列提出的。就中国来说，它答应在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担负义务的框架内进行。这就是说，两国外长只是以出席联大会议的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会晤，而不是两国或两国政府之间的双边接触。据报道，在这次特别的首次会晤之前，先进了几次较低级别的外交接触。在80年代前半期，就不断有报道说，两国在其他方面在进行秘密交往。但这种报道总是一次又一次被正式否认。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对以色列的态度，酷似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而不像共产党集团的其他国家。共产党集团的其他国家与中国不同，长期内同以色列保持着外交和商业关系。但是，文化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的政策和对世界的看法发生很大变化。实现经济现代化成为中国的首要政策目标，中国外交政策的任务则是为现代化和随之而来的对外开放服务。在国家政策和对国际事务看法上发生的这些变化，使中国不再“不把以色列当成一个国家”，从而使80年代初同以色列的秘密接触

和交流成为可能。从1987年两国外长在联大会议期间首次会晤起，经过4年的时间，两国才踏上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门槛。

本书是我个人记叙的中国和以色列在北京秘密进行正式接触的情况。记叙从作者作为以色列科学及人文科学院驻北京联络处特别顾问于1991年3月初抵达北京开始，到1992年1月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作结。驻北京联络处是1990年建立的。根据两国外长1989年秋在每年一度的联大会议期间会晤时达成的协议，两国决定互设非政府机构，中国在以色列建立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的支社，以色列在北京建立上面提到的联络处。联络处于1990年6月正式建立。

1990年9月，两国外长在联大会议期间在纽约会晤。以色列副总理兼外长戴维·利维在会晤时建议，我们派遣“一位资深大使”去北京联络处工作，以便加强两国在北京可能进行的对话，并使之更加正常地展开。中国方面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反应。经过几个月的耐心等待与准备，我们于1991年初得到通知：伦敦的中国大使馆领事部将给我发放签证。除了联络处负责的学术和农业方面的交流之外，我的任务是进一步促进两国在政治方面和官方渠道上进行审慎的交流。

联络处建立还不到一年，中国就同意联络处增加政治职能，同意联络处增加一位资深外交部官员。此举意义重大，预示着两国的接触和两国的关系将进一步发

展。从此，这两个一直没有正式关系的国家，在走向关系正常化的缓慢、渐进的过程中，开始步入第三阶段。80年代早期和中期，新闻界就不断报道中以两国之间的各种接触，尤其是1979年中国和越南发生边境冲突之后中以两国军界的接触。有时，报道还配有照片，宣称以色列的大炮安放在北京每年军事检阅用的中国坦克车上。对这些新闻报道，双方均正式予以否认。这可以算作两国高度审慎交往的第一个阶段。这种交往是出于双方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中国在文化革命后对世界的看法发生变化的结果。

中以两国交往的第二个阶段，不只可以追溯到两国外长在联大会议期间最初的会晤，还可以追溯到两国在其他地方的审慎接触。以色列驻香港总领事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之间的接触，为两国外长的会晤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建立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驻特拉维夫办事处和以色列科学及人文科学院驻北京联络处这样的非政府机构奠定了基础。

即将开始的第三个阶段，是北京和耶路撒冷之间、也是两国外交部之间直接的、但仍是秘密进行的政治与正式交流的最后阶段。正是这一阶段，将最后导致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此时的的问题是，由于中国方面小心翼翼，办事颇有耐心，喜欢一步一步走，这一阶段真不知会延续多久，发展会多么缓慢，到两国建立全面、公开的关系还究竟需要几年时间。

目 录

中文版序	1
前言	1
●1. 北京发轫	1
●2. 第一个飞跃	18
●3. 扎根	32
●4. 一个新飞跃	44
●5. 探索	64
●6. 从音乐晚会到北海公园	79
●7. 新微调和老主张	94
●8. 新进展——莫斯科的振荡	105
●9. 香港——东京——纽约	120
●10. 正式建交迫在眉睫	138
●11. 完成建交的访问——再也不严格保密	159
●12. 新篇章	180
后记	186
附录：叩击神秘的犹太国之门	高秋福 192
译后记	234

1 北京发轫

3月初并非一年中去北京的最好时节。这时的空气潮湿、冷峭，天空总是阴沉多云。由于几百万个家庭、机关和工厂整个冬天都烧煤取暖，天空中布满巨大的云团，或者说弥漫着半凝结状态的烟雾。而早春的潮气使这种云团或烟雾显得更加浓重。这就遮蔽了西部和北部的山峦。在气候宜人的季节，这些山峦给这座平淡无奇的庞大城市平添了一道亮丽诱人的风景。

城里没有多少常青植物。城内的每条道路两旁都有繁茂的花木，在其他季节会绽放出美丽怡人的鲜花，而这时却仍处在严酷的冬眠状态。高耸的办公楼和住宅楼，还有城中那纵横交错的宽阔的街道，看上去光秃秃的，毫无生气，对新来客既没有感召力又显得很冷漠。北京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是一座象蚁山一样人头涌动的城市。到处都是人。中国人喜欢户外活动，而在一年的这个时节，他们冒着严寒，比在温暖的季节走得还

快。他们穿着好几层衣服。这是中国人传统的严冬御寒的办法。这同人们，特别是同儿童和年轻人在其他季节穿的轻便的、多彩多姿的衣服相比，给人留下一个单调划一的印象。

1991年春天给我这个新来客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活力与繁荣。就全中国而言，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百分之七的速率在增长。城市的增速比这还要高得多。中国人希求的物质福利，亦即衣、食、住、行，显然都大大得到满足。每条街道都是一个繁荣的市场。1991年，60%以上的农产品是由私人销售的，其中大部分是由农民及其家庭成员设在街头的摊位销售。人们显然是食丰衣足。食品店和服装店货源充足，购销两旺。这是物资丰盈的明证。一两年之前所有的人都穿的那种黑帆布胶底鞋，很快都被大量中国生产和进口的西式皮鞋所取代。在春节或其他节日，普通老百姓在回答别人的问候时，能够而且确实是经常这样说：“每天都像过年。”这不是一句普通用语。这是我的中文老师给我讲的。他很可能只想用这种方式向外国人表示，他对新中国的富足和稳定感到自豪。长期以来，中国人曾一直遭受盘剥、苦难和动乱。在1960年到1961年的大饥谨时期，估计有两三千万中国人死于饥饿。随后就是十年文化革命那严酷而痛苦的状况。而现在，每天都有充裕的食品、衣服和家庭欢乐，公众和个人昔日遭受的苦痛和折磨都一去不复返了。

这就是中国，就是为在本世纪最后 20 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而奋进的中国。翻两番这一目标，是政界元老邓小平和党的领导人在 1982 年举行的第十二次党代会上确定的。1989 年春夏之交北京政治风波之后，中国并没有蜕变成一个更加刻板、更加封闭的社会，也没有倒退到“抗议和镇压的恶性循环”之中去。1991 年的早春，迎接我这个北京新来客的是这样一番景象：充满活力的经济，日益显现的市场力量，开放的气氛。这一切只用经济术语是决难以表述的。对一位新委派到以色列科学及人文科学院驻北京联络处任职的以色列外交部使节来说，这样一种形势和总的氛围，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他同北京官方接触，仍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学习的过程，起始于初次接触。在机场的边防检查站，两个穿军装的年轻人见到我时显然是大惑不解。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不熟悉以色列护照及其上面的希伯来文印记，而更主要的是因为，护照虽然无需倒着看，却需从后往前翻。我踏上中国土地后说的第一句中国话，就是向他们解释：我来自以色列；护照上那些古怪的文字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是从右向左读；因此，护照需要从右向左翻。但是，令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这种稀奇古怪的洋鬼子的怪玩艺儿。我一说到以色列，他们就不由绽放出中国人特有的迷人的笑容，年轻的脸上熠熠生辉。他们对我说：“以色列

强大，以色列有实力，以色列自力更生。”“自力更生”是一种非常令人敬佩的毛主义品德。这个词经常出现在中国的套话和俗语中。

这是我第一次同中国人接触，它非常说明问题。这两个年轻人对以色列的了解，只能通过他们经常阅读和收听的中国媒体的报道。而中国媒体报道的总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它对阿拉伯邻国的侵略行径，它对国土被它占领的巴勒斯坦人的残酷镇压，它对西方帝国主义及其利益的奉迎。然而，他们根据本能的常识，却从这种说教和反对以色列的宣传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正如一位中国朋友后来对我所说的那样，在以色列最近所犯罪行的报道中，他们从电视新闻广播或人民日报版面上看到的，却是那张中东地图，那张包围着以色列的广大阿拉伯领土的地图。他们由此明白了，小小以色列却能够对付那些穆斯林乌合之众，能够坚持不懈地对付盛产石油的广大阿拉伯腹地。以色列的这一形象赢得他们的尊敬，而不是敌意。中国人习惯从字里行间寻找微言大义，习惯从官方媒体提供的材料中作出自己的判断。我后来接触的一些中国人，虽然他们都是平生第一次碰到以色列人，但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反应，却几乎总是同北京首都机场那两个准军事人员首次表露出来的反应一模一样，积极而又热情。

从这初次接触中，还可以得到另外一个重要启示。在对以色列客人表示最热情、最友好的欢迎的时候，那两

个年轻中国人并没有相互提防,也没有担心这样做会不会违背上级确定的统一口径,会不会违背官方正式确定的对以色列的态度:即使不敌视,也要对立。我看到的是毛之后的中国,经历了“第二次革命”的中国,进入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具有更广泛思想和言论自由的中国。

我在北京开始第一轮拜访活动。当然,我不像一些大使那样,按正式开列的名单进行拜访。对一位新上任的大使来说,他履新后的最初几周和几个月时间,都会用来进行正式拜访活动,要拜访官方人士,还要拜访大使同僚。这些活动会帮助他结识一些适当的人士。在后来的日常工作中,他在许多问题上会征询这些新结识的人士的意见,而他们也会给他出主意。在正式场合和招待会上,他会经常见到这些人士。这些人士构成一种非正式的职业行会,而他自然是这种行会的一个成员。

我自己的情况全然不同。我在外交界和正式场合没有身份和地位。驻在国政府希望我保持一种低姿态,身份是学术机构顾问,不能公开闯入正式的外交场合。我自己也无意于参与那种活动。一些驻北京的大使,有的是我过去任职时认识的,有的是从我们都认识的朋友和同事那里获悉我到任的消息的。他们知道驻在国政府对我的特殊地位所持的保留态度。这有可能妨碍他们同我接触。另一方面,根据我来北京前作出的安排,我同外交部的接触起初确实只限于西亚北非司。

北京有 1000 万居民,100 多万辆自行车,以及两轮